

第一集

台灣黨外領袖人物



李達編著
可出版

70017

台灣黨外 領袖人物

第一集

李 達編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書名：台灣黨外領袖人物（第一集）

編著：李達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電話：5-753877

發行：華風書局有限公司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七樓 電話：5-749495

承印：友利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87年4月初版

1987年8月再版

定價：港幣30元

書號：ISBN 962-226-117-5

目 錄

台灣黨外運動與黨外人物.....	李 達	1
民主進步黨主席江鵬堅談新黨在		
台灣的前途.....	戶張東夫	36
〔附〕江鵬堅簡歷.....	李 達	59
尤清其人其事.....	李 達	61
許信良事件來龍去脈.....	李 達	69
〔附〕許信良生平.....	李 達	81
謝長廷面臨考驗.....	李 達	87
訪黨外新星謝長廷.....	原田涼	90
黨外「大老」余登發.....	李 達	114
費希平和民主進步黨.....	李 達	127
林正杰的路向.....	李 達	136
高俊明想做台灣政治主教？.....	李 達	153
台灣黨外勢力劃分.....	李 達	162
陳水扁、江鵬堅與「五·一九」綠色		
行動.....	民主時代	179

台灣黨外運動 與黨外人物

李 達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台灣收歸中國至今，已逾42年。42年來，台灣地區出現過幾次要求政治改革的民間運動，或稱黨外運動。

在台灣，最先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除了早年的台共以外，就是1947年3月上旬，因「二二八事件」而由台灣省民意代表為主體所組成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當時，該委員會曾提出過32條政治革新要求，但一週後，該委員會便因事件的解決而烟消雲散。

厲行「戒嚴法」， 嚴禁組黨，實施報禁

國民黨政府自1949年被迫遷台後，便厲行戒嚴法，這個戒嚴法實施至今長達38年，是全世界實施時間最長的戒嚴法，直到最近才宣佈要解除，這對言論

自由當然有很大壓制。國民黨當權派自大陸撤退去台後，在台灣繼續實行一黨政治，除了青年黨、民社黨這兩個早於1949年之前便成立的、力量微不足道的「友黨」，作為台灣「民主」政治的花瓶外，國民黨政府在台灣一直禁止人民設立政黨，1951年以後更厲行報禁，只是直到1986年9月，民主進步黨突然成立，衝破黨禁，才變得無可奈何。

但台灣的黨外運動和民間抗鬥，38年來一直未平息過。而這當中，以1960年的「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70年代初期《大學》雜誌知識分子集團的政治革新運動，以及70年代中期發展至今的「黨外」運動和事件（如「中壢事件」、「林正杰事件」等），為最明顯。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籍的雷震創辦《自由中國》雜誌，鼓吹民主思潮，要求國民黨政府停止一黨專政。此後雷震更於一九六〇年籌組「中國民主黨」。終於爆發出事端，事件的來龍去脈是這樣的：

「中國民主黨」發展的來龍去脈

「中國民主黨」的組黨運動，主要是由兩股力量結合形成。其中是一九四九年以後從大陸到台灣去的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另外是台灣本地的政治人物和社會活動家。當時有一種傳說是，他們背後有美國力量的支持。在宣傳陣地上，他們以《自由中國》雜誌為傳媒，再配合地方選舉活動，而形成一種有別於國民黨的新黨運動，準備和國民黨分庭抗禮。

新黨運動的展開雖然在一九六〇年，但是這一運動的根源，則必須追溯到《自由中國》雜誌的創刊。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節節失利，大陸情勢產生巨變，國民黨政府輾轉播遷多處。在危局中，一部分國

民黨人和社會上層的自由主義者，為着日後的立足發展，乃要總結經驗，建立一個宣揚所謂「民主自由」的言論機關，要求國民黨停止一黨專政，用新的方法進行「反共」，是時胡適、雷震、杭立武等人，決定創辦《自由中國》雜誌。其實這些人原本都是和國民黨最高當局關係密切，甚至在國民黨內身居要職的。胡適曾任台灣駐美國「大使」，雷震是國民黨政府的政務委員，級別都相當高。

當時，《自由中國》雜誌的發行宗旨，共有四點，即：

「第一、我們要向全國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並且要督促政府（各級的政府），切實改革政治經濟，努力建立自由民主的社會。」

第二、我們要支持並督促政府用種種力量抵抗共產黨鐵幕之下剝奪一切自由的極權政治，不讓他擴張他的勢力範圍。

第三、我們要盡我們的努力，援助淪陷區域的同胞，幫助他們早日恢復自由。

第四、我們的最後目標是要使整個中華民國成為自由的中國。」

這四個發行宗旨的條文，係由胡適草擬。刊登在每一期的雜誌上。

這個「發行宗旨」，擺明是要促進改組國民黨，建立新的力量，用新的方法去重新收拾殘局，進行「反共」。

《自由中國》半月刊的背景

《自由中國》半月刊創刊於1949年11月20日。當

時，美國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已有幾個月，國民黨情勢不妙，美國一度準備拋棄蔣介石，而國共之間，又強弱懸殊，國民黨兵敗如山倒，最高權力架構從廣州遷往重慶，並準備從重慶遷往台北。際此軍事逆轉、外交失勢孤立，以宣揚「民主自由」為新號召的反共刊物——《自由中國》，撫緝流亡，開拓新貌，對於國民黨作出側面的幫助，當時對蔣家政權是很有裨益的。然而，隨着1950年韓戰的爆發、美國對中共採取圍堵政策、第七艦隊駐防台灣海峽、美援的恢復、台美共同防禦條約及台灣當局與日本和約的簽訂……國際局勢的連串變化，逐漸有利於台灣國民黨當局，使其得到喘息的機會。由於台灣國民黨當局在台灣的權力已漸趨穩定，《自由中國》雜誌的存在價值，對於國民黨政府而言，自然今非昔比，而且逐漸有點如芒在背了。特別是隨着台灣內部政治、經濟情況變化（包括黨化政策），這份抱持民主自由理念、以反共起家的知識分子刊物，漸漸將論政的方向轉向對台灣內部問題的反省與檢討，對台灣社會和當權者帶來了不安定的因素，這就和國民黨當局產生了矛盾和衝突。《自由中國》的論調和筆鋒所向，到1956年10月31日以後，更邁進了新階段，出現了新情況。

祝壽專號引起風潮

一九五六年十月卅一日是蔣介石七秩大壽。蔣介石對外表示「婉辭祝壽、提示問題、虛懷納言」。他既然提出這個「謙誠」的呼籲，於是《自由中國》乘機推出「祝壽專號」，請胡適、徐復觀、毛子水、徐道鄰、陳啓天、陶百川、蔣勻田、夏道平、雷震等，分別為文

對蔣介石及台灣國民黨的施政提出檢討和建言。該期（第十五卷第九期）《自由中國》雜誌出刊後，因內容刺激，銷路大增，印至七版，連續發行了數月，吸引了海內外廣泛注意。自此，《自由中國》乘着此勢，對時政批評愈來愈激烈，針針深入現實政治的核心問題。從一九五七年底起，到五八年中的七個月內，提出長達十五篇的「今日的問題」。接着，是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間的「修憲問題」、「政黨承認問題」，言論調子節節昇高，步步矛頭踏觸台灣執政當局的禁忌，終於遭到國民黨當局的「正視」，給予了一次又一次的圍剿。

《自由中國》雜誌原先純屬書生論政，又隔於方言，因此沒有台灣本地羣衆基礎。但是他們提倡民主自由的理念，以及敢於對時政痛下鍼砭的言論，對於當時台灣的部分本土精英——那些曾經直接受過日據時代民權運動洗禮、曾經在終戰後熱切期待參與祖國政治，而却在「二二八事件」前後對政治感到失望的本地知識分子——而言，是相當具有共鳴作用的。因此，《自由中國》的知識分子們，與台灣本土的部分精英分子的結合，也就水到渠成，形成一股氣氛了。

以地方選舉為媒介 活動愈來愈頻密

而他們的結合，又以台灣地方選舉為媒體，開始組織基層力量了。一九五七年《自由中國》出刊「祝壽專號」的約半年後——台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議員的選舉。第二次競選彰化縣長的石錫勳（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協會理事），以及郭發（日據時代台灣《民

報》老記者）和王燈岸（日據時代文化抗日分子）等三人，計劃在選舉前夕籌組「黨外候選人聯誼會」，研究選務，並仿照日據時代的文化巡迴演講的形式，舉辦民衆座談會。經已七十高齡的郭發奔波聯絡結果，台灣中部地區的候選人首先相會，共推彰化縣長候選人石錫勳、台中縣長候選人楊基振、台中市長候選人何春木三人為發起人。1957年4月11日，終於在台中召開第三屆臨時省議會及各縣市長候選人關於選務改進的座談會，提出五項議案，同時共推「民社黨」和「青年黨」為該建議案向台灣國民黨政府交涉的代表。會中並決議，在本屆選舉完後，由李萬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李南雄的父親）負責盡速召集一個選舉檢討座談會。

「五龍一鳳」的出現

在該次選舉中，台北市的郭國基、台南縣吳三連、高雄市李源凌、宜蘭縣郭雨新、雲林縣李萬居、嘉義縣許世賢，當選省議員。這便是後來所謂台灣「省議會五虎將」及「五龍一鳳」稱號的由來。

1957年5月18日，台灣省各地前來的無黨籍和民、青兩黨候選人齊集台北市蓬萊閣，召開選舉檢討會。《自由中國》的雷震，亦參加這次會議，並發表演說。

這次的選舉檢討座談會，決議由李萬居、石錫勳等與會的78人為發起人，籌備設立「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曾兩度向台灣政府當局提出申請，但未獲准成立。當時《自由中國》從大選前起，即由該刊十六卷七期（1957年4月1日）開始，連續刊發朱伴耘的《反

對黨！反對黨！反對黨》等文章，而胡適也於五月間自美國返台，於1957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國社發表「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的演講，呼籲結合知識分子與民主人士組織新黨，由於鋒芒太露，聲勢過盛，嚇驚了國民黨當局，因此「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的申請遭到批駁。台灣當局判斷這種結社是在為組織新黨鋪路，與美國和海外方面相呼應，這種聯想，的確也不是空穴來風。事實上，歷史的發展告訴我們，他們的組黨運動確實是循着選舉的改進座談會而進行下去的。

《民主潮》、《公論報》的呼應

從台灣第三屆地方選舉起，《自由中國》雜誌便開始對地方自治、地方選舉的問題大加討論。而該刊《今日的問題》等一系列文革，也是由1957年7月起陸續發表，有系統地全面檢討當時台灣所有政治、經濟、教育、軍事、新聞等問題，而以「反對黨」問題作終結，認為「反對黨是解決一切問題關鍵之所在」。自此，《自由中國》積極推動反對黨運動，與青年黨的機關報《民主潮》和李萬居的《公論報》互相呼應。

「中國地方自治研究會」雖未能合法成立，但台灣全省無黨派的人士，深覺其在野的力量有保持的必要，便以「民主人士聯誼會」的名稱相聯繫，到了1960年的地方選舉來臨時，又改稱「選舉改進座談會」作全省性大規模的組合。

1960年的地方選舉，正式呼籲籌組新政黨，使組黨工作進入懷胎時期。1960年2月，台灣地方選舉的前夕，李萬居、郭雨新、高玉樹、吳三連、許世賢、

楊金虎等人，召開了一次選舉問題座談會。雷震和「青年黨」領袖夏壽聲、「民社黨」主席蔣勳田都出席參加。地方選舉後，1960年5月18日無黨籍人士和雷震及民、青兩黨人士共72人，在台北市「民社黨」總部召開「在野黨及無黨派人主本屆地方選舉檢討會」。會中激烈批評當局選舉舞弊。郭國基在會中慷慨陳詞，「希望把民青兩黨整個全部解散，和台灣一般民主人士共同來組織一個強有力的在野黨，發揮民主的力量。」與會人員原來無立刻組黨之念，經郭國基的一席話的刺激，大家遂激動地計劃要籌組一個新黨。當天會議，達成四點決議，包括即日起組織「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並在各地設立分會。

新黨運動緊鑼密鼓 選舉改進座談會正式成立

這一組織的成立，配合幾年來《自由中國》雜誌對組織新黨的鼓吹與呼籲，使得新黨運動進入了緊鑼密鼓的新階段。一連串的活動也就密集展開。從以下接二連三的活動，可以窺知新黨運動的積極態勢：

1960年6月15日，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了長達一千多字的聲明，宣佈：

(1)、選舉改進座談會正式成立，在不分省籍、不分黨派的原則下，遴選55個委員；

(2)、團結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並與民、青兩黨協商，立即籌組一個新的政黨，為「真正的反共」、「真正的民主」而奮鬥，務使一黨專政之局，永遠絕跡於中國。

1960年6月26日，選舉改進座談會在台北召開第

一次委員會，推出17名召集委員。並推雷震、李萬居、高玉樹三人為發言人。繼而開始一連串至省各地的巡迴座談會——從7月中旬到8月底之間，先後分別在彰化、台中、嘉義、高雄、中壢等地舉辦改進座談會。並宣佈新黨即將成立。當時估計與會的地方人物約四百餘人。9月1日，台灣選舉改進座談會發表一篇「緊急聲明」，除了對新黨分子近日內所受到的干擾提出控訴外，並聲稱：

「由於組織新黨的運動已經是海內外民主反共人士一致的願望，而在國內是由下起來的潮流。我們現在對於新黨的政綱、政策、黨名及黨章等都已有了初步的定案，預定在九月底以前即可宣告成立，我們敢斷定這不是任何干擾所能阻止的。」

雷震、傅正被逮捕 蔣介石採取果斷措施

組黨運動到此已呈勢不可止的地步。然而，正在1960年9月1日《自由中國》雜誌發表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而聲稱組黨是任何洪流所無法阻擋的三天後，1960年9月4日，台灣警備總部以涉嫌叛亂的理由，逮捕了雷震、傅正等人。

雷震等人被捕後，胡適、蔣勻田、左舜生等曾多方設法營救不果。而地方選舉改進座談會雖然旋即成立「中國民主黨籌備委員會」，但未幾，新黨運動終因蔣介石的果斷措施而夭折。

此後，整個台灣政治局面和社會言論，在60年代籠罩着一道極強低氣壓，國民黨政府乘勢進擊，不斷加強對人民的思想箝制。在雜誌方面，《自由中國》停

刊後，除了一本非政治性的《文星》雜誌，在文化問題作出一些批判和怒吼外，便沒有任何重要和獨立於官方的政論性雜誌。當時，台灣青年大都感到失落、無根。可以說，60年代是台灣政治景氣低迷的年代。

接着，在1966年，中國大陸爆發了「文化大革命」。在台灣，當局實行推廣「文化復興運動」，又厲行「反共」、「恐共」的宣傳，兩岸的往來基本斷絕。而台灣民眾在高壓而嚴厲的控制下，不同言論很少，可謂銷聲匿跡了。

70年代的國際氣候

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歐美學潮澎湃，在1970年初，在美國、香港和台灣的知識分子中，也發生了聲勢浩大的「保釣」事件。而從1971年初開始，毛澤東、周恩來在「文革」高潮過後，突然開展乒乓外交，接着，美國國務卿基辛格秘密訪華，1971年10月底，中共進入了聯合國，台灣被驅逐出聯合國門外。而在1970年至1974年間，國際上大多數國家更紛紛和中共建交，台灣的「外交部」變成了「斷交部」，1975年4月5日，蔣介石更在這一片不利的氣氛下，與世長辭。這樣，由於國際外交逆勢的刺激，台灣新一代知識青年在內外環境刺激下，又凝聚起一股政治革新力量，組成了相當堅強的筆陣，以《大學》雜誌為園地，作了一次集體性的意見表達。

《大學》雜誌原創刊於1968年，但真正形成一種政治革新運動，則要到1970年的改組。1971年初開始，國民黨遭逢連串空前打擊與重創，在這之前，70年下半年開始，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辦了兩次青年人上座

談，會中許多青年對當時局勢提出許多批評，台北市青商會長張紹文提議召開青年國是會議，起用優秀青年，貫徹政治革新，同時發行一報一刊以團結海內外青年。後來國民黨當局暗示要他們籌辦一本《中國青年》雜誌，但為他們所婉謝。之後，在幾位熱心分子的奔走推動下，絕大部分參加過座談會的青年，加入了《大學》雜誌，這是《大學》雜誌改組的由來。

《大學雜誌》的躍起

《大學》雜誌擴充改組後，社務委員多達五、六十人，網羅了當時學術、政治、企業界的新生人才。

改組完成後的大學雜誌，恰逢該誌創刊三週年，於是就以此為名目，在三週年的紀念刊（第卅七期，1971年元月號）上，《大學》的言論開始大幅度地呈現出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劉福增、張紹文、陳鼓應以聯名的方式發表《給蔣經國先生的信》，提出三點建議：

- (1)多接觸想講真心話的人；
- (2)提供一個說話的場所；
- (3)若有青年人被列入「安全記錄」而影響到他的工作和出國時，請給予申辯和解釋的機會。

在該期雜誌上，陳鼓應還發表了《容忍與了解》，張俊宏發表了《消除現代化的三個障礙》，邵雄峯發表《台灣經濟發展的問題》、陳少廷發表《學術自由與國家安全》……等重要文章，這些都是《大學雜誌》改組後所展開的呼籲政治革新的先聲。

《大學》雜誌自1971年起，開始提昇對現實政治問題的關切，顯然係受到1970年底的釣魚台事件以及海外知識青年的保釣運動的影響。71年4月，《大學》雜

表一：批判國民黨勢力的年齡分配表

	資料 年代	60歲 以上	50至 59歲	40至 49歲	30至 39歲	30歲 以下	人數	平均 年齡	按年歲 排名
《自由中國》編輯部	1960年	4	4	1	4	0	13	49.7	②
改進座談會中之新 黨召集委員	1960年	7	7	3	3	0	22	52.1	①
《大學雜誌》的編 委、常委	1971年	0	0	2	26	3	31	35.2	⑧
《臺灣政論》的核心 分子	1978年	0	0	1	4	1	6	35.8	⑩
「高雄事件」前的核心份子	1979年	0	4	13	18	6	41	38.4	⑥
「高雄事件」後的核心份子	1986年	1	9	17	14	0	41	43.7	④
黨外「後援會」推薦 「立委」候選人	1986年	1	1	14	4	1	21	44.0	⑨
黨外「後援會」推薦 「國大」候選人	1986年	0	2	8	10	2	22	38.7	⑮
小計（人數）		13	27	61	83	13	197		

表二：批判國民黨勢力的省籍分配表

	①外 省籍	②臺灣 省籍	人數
《自由中國》編輯羣	13	0	13
改進岸談會中之新黨 召集委員	8	14	22
《大學雜誌》的編委、常委	14	17	31
《臺灣政論》的核心份子	0	6	6
「高雄事件」前的核心份子	1	40	41
「高雄事件」後的核心份子	4	37	41
黨外「後援會」推薦立委 候選人	1	20	21
黨外「後援會」推薦「國大」 候選人	0	22	22
小計（人次）	41	156	197